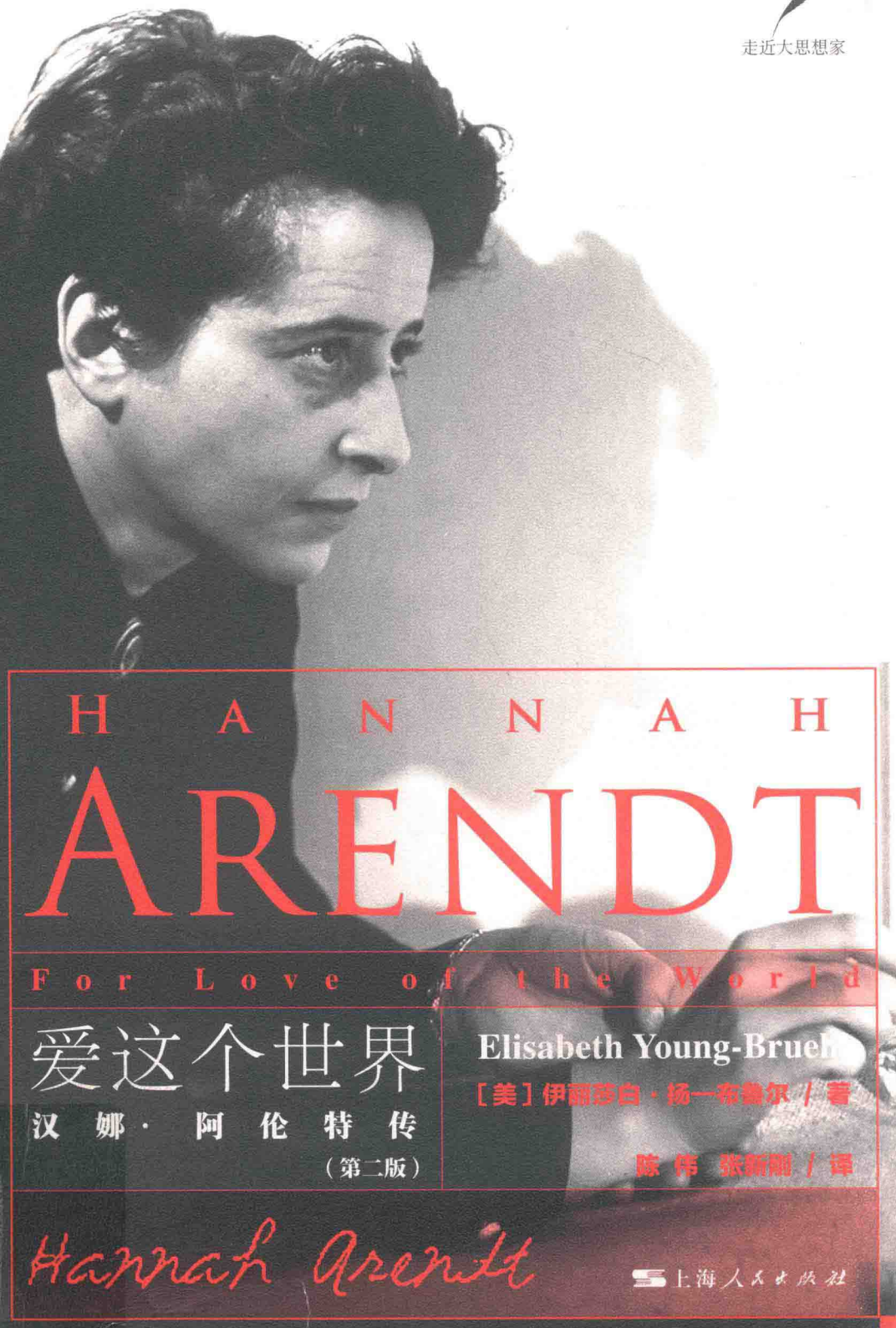


走近大思想家



H A N N A 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爱这个世界

汉娜·阿伦特传

(第二版)

Elisabeth Young-Bruhl

[美]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 著

陈伟 张新刚 / 译

Hannah Arendt

上海人民出版社

HANNAH ARENDT

F o r L o v e o f t h e W o r l d

爱 / 这 个 / 世 界

汉娜·阿伦特传

Elisabeth Young-Bruehl

[美]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 著

陈 伟 张新刚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美)伊  
丽莎白·扬-布鲁尔著;陈伟,张新刚译. —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7

(走近大思想家)

书名原文: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2E

ISBN 978-7-208-14330-2

I. ①爱… II. ①伊… ②陈… ③张… III. ①阿伦特  
(Arendt, Hannah 1906-1975)-人物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9368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营销编辑 许卓  
装帧设计 消食片儿

走近大思想家

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第二版)

[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著

陈伟 张新刚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38 插页 5 字数 522,000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4330-2/K·2589

定价 98.00 元







## 中译本序言

陈 伟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之杰出女性大家，独汉娜·阿伦特一人。她的人格与思想，皆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阿伦特 1906 年出生，1975 年去世，属于 20 世纪的人物。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四十余年。她的著作，虽紧扣时代脉搏，多直接取材于现实，却并不因时过境迁而被人淡忘。如今，阿伦特在中国，还呈现出颇为热门之象；阅读阿伦特，蔚然成风。而研究阿伦特，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迄今仍不显得“过时”。

阿伦特曾说，历史叙述的要义，不是构建某种理论图式，不是揭示某种必然法则，而是要学会讲故事。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独一无二的。有的故事是喜剧，有的故事是悲剧，有的故事是正剧；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离奇；有的令人愉悦，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叫人压抑。阿伦特自己的故事是什么？被她的文字打动后，我们特别想知道，她那充满激情的文字背后站着何等样人？

阿伦特到达美国之前，有过很长一段时间漂泊生涯。她是犹太人，这个由不得自己选择的出身，在纳粹德国却是一种“罪过”。如彼时德国其他犹太人一样，阿伦特作为犹太人，面临着种族主义的迫害，并因此而流亡。流亡他国期间，她不过做零工度日，还要着手自己的学术研究。其对现实

政治主动或被动的介入,亦从未中止。阿伦特著作中常见的“无根”、“无助”、“漂泊”、“无家可归”、“疏离”、“恐怖”、“绝望”、“重负”、“孤独”、“爱”,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些词语,对阿伦特而言,则是真实的生活,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好在阿伦特有一批不错的师长、朋友,环绕周围,时时给她襄助,还有其丈夫布吕赫,与她生死与共。他们的存在,给严峻生活境况中的阿伦特以慰藉,以希望。阿伦特曾言,在 20 世纪生活,如同下雨天出门没带伞,只有在大雨中行走,任雨点打在自己的脸上、身上。然而,日子再苦,也还要过。人们只有期盼雨过天晴,期盼苦尽甘来。然而,这种期盼,绝非消极等待。世界愚陋不堪,我们仍须保持对“世界的爱”。不是遁入私域独善其身,也不是玩世不恭地在与魔鬼共舞中游戏人生,而是人人觉悟,向“生”而生,共同参与世界的建设,俾使自由得以落实,天性得以保存,让我们在世间如在家中。这,便是最大的政治。

阿伦特在德国接受教育,博士毕业后不久,其学术生涯刚刚起步,就赶上了纳粹运动,同样属于“被时代耽误的一代人”。她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美国完成的,彼时她已经是一位中年妇女。阿伦特的著作中,可以察觉出一种顽强的精神,因为她要面对的是 20 世纪最极端的“恶”,要处理的是最令人绝望的政治经验,而她自己又是恶劣政治经验的亲历者、残酷统治的受害者。即使她后来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不再有生命危险,她仍然守望着公共世界,对各种危机、弊政不遗余力地进行剖析、批判。伊丽莎白·扬-布鲁尔的《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正是围绕阿伦特与“世界”的互动、交流展开。“爱”与“世界”,皆为本书的关键词,原本也是阿伦特政治思想中的关键词。阿伦特作为孩子进入这个世界,作为老人离开这个世界。但她的思想学术成就,并不因其去世而化为尘埃,它已成世界之一部分,构成了“后来者”生活的背景与参照。世界记住了她!

阿伦特的故事甚为丰富。她与污点哲人海德格尔的师生恋情,藕断丝连,纠缠不清。此事最早正是由该书曝出。海德格尔至死不就他当初与纳粹的合作认错,阿伦特却毫不计较。阿伦特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也要等海德格尔耳聋眼花、行将就木时才开始。因为她不想让海德格尔看到她



的批判。初恋难忘，刻骨铭心，竟至于此！阿伦特与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则交流甚好。阿伦特去瑞士巴塞尔看望年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及其夫人，就如女儿回娘家一样。其情其景，轻松自如，正是阿伦特所说的“如在家中”的感觉。而阿伦特丈夫布吕赫，与阿伦特的母亲关系紧张。当玛萨·阿伦特搬到亲戚家别居时，布吕赫夫妇竟然甚为愉快，有获得解放的感觉。工人出身、自学成才、醉心于密谋革命的布吕赫，与巴黎音乐专业学习毕业的阿伦特母亲，其品味与“礼貌”，过于悬殊，难以共处，可以想见。阿伦特却与布吕赫恩爱一生，足见阿伦特的风格，不是中产式的。

事实上，阿伦特对“中产”、“小资”的厌恶，不仅体现在她的生活中，在其著作中，亦有体现。阿伦特十分重视的，是政治的“人民性”、学术的“人民性”。本书所用的“her people”，固然指她所属的民族（犹太民族），但更为重要的，它是指她的“人民”（相对于精英、暴民而言，当然，也不同于大众）。彼时，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常在没有民意支持、脱离人民的情况下，试图以外交手段或党派利益交换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有的犹太人社团领袖，竟配合纳粹，将自己的“人民”圈出送入灭绝营。知识精英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规模变节，与暴民联手，促成极权主义，亦令阿伦特不屑。唯有在人民自发革命中，阿伦特看到了希望。在此意义上，笔者不妨赠其一荣誉称号：人民政治学家。

阿伦特在战后曾写下大量时政评论，她关于“小石城事件”、“艾希曼审判”、“五角大楼文件”皆有宏论，也因之常陷于公共论争之中。然而，阿伦特从事的主要还是一项思想事业。她主要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卓越的政治思想家或曰政治理论家。她面对采访者，还特别指出，不要把她和哲学界的人相提并论。她有意与哲学家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她认为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巴门尼德始，即带有对政治深深的傲慢与偏见。阿伦特既不致力于阐发一套新体系，也并不单单靠断片式的名言警句去启迪人，她的著述，更不能总结概括为僵化的教条。她的思想事业，一直在进行中。她去世时打字机上未打完的《心灵生活》书稿中的一页就是一个象征，她的思想事业，与生命同步。阿伦特曾说，她所做的，是想要读懂这个世界。

我们了解了阿伦特著述的风格,也就明白了阅读阿伦特时的注意事项。批驳阿伦特的观点,或者把阿伦特的观点当成真理,都会造成对阿伦特政治思想实质性的误读与背离,从而失去从阿伦特那里汲取灵感的机会。想当然地去推测阿伦特的意图,信口开河,由此陷入无谓的争论,亦不可取。例如,人们觉得阿伦特一定是极其敌视马克思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阿伦特的丈夫是德国共产党员,阿伦特对德国共产党甚为同情;她的《人的境况》,是研究马克思的项目成果;对于马克思,她是把他的思想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看的。她认为马克思站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终点上,属于19世纪,固然问题甚多,其说与20世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毕竟不同。当然,在雅斯贝尔斯的提醒下,阿伦特后来更多地倾向于否定马克思,亦是事实。再如,关于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报道引发的争议,阿伦特曾说,她原本可以不用“恶的平庸性”(the banality of evil)这个说法。国内不少中译将这个术语译为“平庸的恶”,实属错译,由此自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联想。阿伦特在用这个术语时,讲的不是普通人作了大恶,把纳粹屠杀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而是恶本身并非来源于某种极端的堕落状态或扭曲心理。她认为,艾希曼的例子,揭示了一种恶的新来源。在艾希曼的例子中,恶,源于“无思”(thoughtlessness)。此种恶和作恶者是平庸还是杰出无关,与受害者是否敢于反抗、勇于牺牲无关。“平庸性”在此描述的是恶的性质。

阿伦特从不自言“走出洞穴”或发现了永恒法则,她情愿声称自己的思想是管窥蠡测。她的不少观点,即使在西方,也是备受质疑。她对苏联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论述方式,其偏颇之处,相信读者会有所鉴别。阿伦特曾言,人是一个条件性(局限性)的存在,对于阿伦特而言,此理同样成立。相信读者在阅读时,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2017年1月20日

## 第二版序言

2003年秋天,我给新英格兰学院的师生讲了一个我最喜欢的汉娜·阿伦特的故事。1969年,阿伦特到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执教后不久,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学生正在抗议“越南战争”,我们去她那儿就是否应该与当地的工会一起策划反战示威征求建议。阿伦特认真听取了正反两方的意见,然后用浓厚的德国语调简洁地说:“好啊,这意味着你们可以使用他们的油印机。”当我讲完伟大政治理论家的这个故事,听众中一位老教师(我的同龄人)笑了起来,而学生们则热切而迷惑地看着。一个“新来者”——阿伦特常常那样称呼学生——后来找到我,对我的演讲表示感谢,因为她从中获得了启发。“我怀着敬畏之心阅读了阿伦特,”她又诚挚地问,“什么是油印机?”[油印机已被淘汰,年轻学生不知其为何物,故有此问。译者注]

汉娜·阿伦特1975年辞世,七年后的1982年,她的传记第一次出版,自那以后,新一代读者已经成长起来。这新的一代现在是用移动电话和电子邮件来组织反战示威了,他们学习政治性思考和行动的世界与阿伦特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虽然前者源于后者。如果我现在来写这本传记,我会新的语境下写作,尽力将这些“新来者”也涵盖在内,对他们来说,构成阿伦特政治思考整体的20世纪中叶的那些事件已经是陈旧的历史,对这些读者来说,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是唯一需要去理解和透彻了解的世界。

有时,我会想修订《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以让其适应当下,适应更为年轻的读者。<sup>1</sup>但是我又常决定保持原样,因为它如阿伦特亲身经历一样,再现了汉娜·阿伦特在那个世界的生活,并再现了在她生命终点之时,她和那个世界是如何被看待和判断的。我在早先的序言中写道:“后代会判断这生活,传记作者只需判断应该讲述的故事。”后世对阿伦特生活的评判已经开始,我想在这里考察一些评判。我也愿意帮助东方的读者,他们可能也有阿伦特对世界的关切,对“世界之爱”,但是他们因为太过年轻而没能直接和她交流——这些读者的年纪和我当时非常有幸在新学院开始我的哲学博士研究生学习时差不多,我在她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她老师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博士论文。

像她的其他学生和她在美国与欧洲成千上万的读者一样,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关于“越战”的一系列事件及其引起的世界范围的反应,还有对由之引起或激发的诸多政治运动的睿智评论。对于那些把阿伦特当作历史人物而非鲜活的评论家的读者,我愿将这本传记设想为对阿伦特的介绍。这个序言将作为向导来揭示她如何在辞世后三十年间变成了那个历史人物。<sup>2</sup>

让我从对阿伦特去世后出版物的考察开始,我在写这部传记的时候,这些出版物的大部分内容我通过她的遗留资料都看得到。自从1978年她未完成的《心灵生活》出版以来,她更大规模的著作集业已出版。这些著作分为三类:通信、未发表的或未收录的文章(德语和英语的)、她的学术日记(Denktagbuch),后者2003年在德国发行,第一版虽然厚达1500页,价格为120欧元,但全部售罄。在写作传记的时候,我看过她大部分的文章,但并没能看到她的学术日记。

她的全部文集由5卷构成,由我的朋友杰罗姆·科恩(Jerome Kohn)编辑出版,科恩睿智而博学,是阿伦特最后的研究助理,现为其遗著保管人。《“理解”论文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于1994年出版。《责任与判断》内含科恩从阿伦特讲座手稿中精心整理出来的关于道德哲学的长文,该书

于 2003 年由绍肯书局 (Shoken Books) 出版 (阿伦特曾在该出版社做过编辑, 把卡夫卡带给美国读者)。第三卷的名字可能为《政治哲学的问题》(*Proble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包含她关于马克思和其他重要讲座足以成书的手稿。阿伦特关于犹太人的著作文集也在筹划之中, 还有一卷是从学术日记中遴选出来的短文的集子。

在今后的几年中, 还会出版她的书信集, 阿伦特全部的通信将得以面世 (现在可以在新学院看到国会图书馆阿伦特著作的电子版)。在已发表的通信中, 阿伦特和他的导师、父亲般的同时也是朋友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件在 1985 年用德语发表, 后来在 1992 年用英语发表, 该书已成为 20 世纪这一类型著作中的经典。欧美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转向这些细致、深入——有惊人预见性的——关于“二战”后美国的共和危机与德国在击败纳粹后的政治复原以及与“过去的主宰”斗争的反思。<sup>3</sup>

《四壁之内》(2000 年) 收录了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赫 (Heinrich Blücher) 长达 35 年共同生活的通信, 布吕赫是她的丈夫, 生于柏林, 属于工人阶级, 自学成才, 聪慧而有魅力。这些通信是贯穿一生的亲密、移民、适应、努力奋斗、疾患、失去和吃惊于新世界这整个过程中充满爱意的交流之典范。<sup>4</sup> 布吕赫哲学计划的一些内容——他是一位教师而非作家——可以从这些通信中透露出来, 特别是他对苏格拉底持久的崇敬 (苏格拉底同样是位教师而非作家), 他挚爱雅斯贝尔斯的世界主义哲学的视野, 在雅斯贝尔斯那里, 文明史可追溯到轴心时期 (公元前 800—前 500 年) 的世界哲学家, 可以进行对话。但是,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通信生动地描述了阿伦特和布吕赫如何为彼此提供他们家的“四壁”, 那是可对话的安全的“四壁”, 在这之中, 彼此之间可以信赖对方的忠诚, 极度坦白他们的力量 and 无力, 并分享他们的希望。

阿伦特与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 的友谊则是通过关于政治与文化的评论交流展开的, 这些交流通常以睿智、尖刻且愉快的漫谈来进行。《朋友之间》(1995 年) 是阿伦特通信中最为美国式的集子, 这本书是研究美国 20 世纪文学生活的必读书。阿伦特与非常重要但仍为人知之甚少的小

说家赫尔曼·布洛赫(Hermann Broch)和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科特·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通信短期内并不会被翻译为英语,也很难找到德国学术界之外的读者。<sup>5</sup>

在写这本传记时,我读过阿伦特—雅斯贝尔斯的书信,阿伦特—布吕赫的大部分通信(少量战前的信后来被发现),以及阿伦特与麦卡锡通信中阿伦特这边的信件。虽然我阅读了阿伦特遗著和马尔巴赫(Marbach)的德语文献档案中所有能看到的信件,但是布洛赫与布鲁门菲尔德并未被收集其中。这些信件现在都已出版,未来阿伦特的传记作家们就能更全面地描述他们的友谊,但是,我想它们不会再为阿伦特故事增加任何重要的事实了。

读完阿伦特—麦卡锡的通信之后,我现在更好地理解了这一友谊的发展过程及其本质。阿伦特往往有一个最好的女友(beste Freundin)。在她年轻的时候,安妮·门德尔松·威尔(Anne Mendelsohn Weil)是她最好的朋友,她十几岁时在哥尼斯堡(Konigsberg)遇到了这个好朋友;尽管阿伦特—回到欧洲就重拾与安妮·威尔的关系,但在阿伦特移民美国之后,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的情人希尔德·弗兰克(Hilde Frankel)则是她的知己。弗兰克 1950 年因癌症去世,之后阿伦特转向玛丽·麦卡锡,这是第一个让她感到亲近的美国女性。虽然麦卡锡比她小六岁,但麦卡锡符合阿伦特对朋友的要求(这些要求在她丈夫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观察和评判世界——既有与他们切近的社会世界,还包括更大的政治世界——的激情,充沛的情感与并非多愁善感的“心”;敏锐的智识,绝无虚伪、骄傲或谄媚的观点;为那些失去传统家庭、共同体或宗教归宿的人通过友谊创建一个家园,对此有着相当的忠诚与理解。

阿伦特同时也能将自己年轻时与其他男性的交往向麦卡锡倾诉,这些事情阿伦特是不会在与布吕赫三十五年的婚姻中及自己的书中说出来的。阿伦特对于麦卡锡来说可能是她的密友——差不多是她的犹太母亲,同时肯定是她的老姐妹,阿伦特不必离开书桌也在操心麦卡锡的事。阿伦特能将自己拒绝了的小说写作、名人社交、文学沙龙和政治行动等生活都委托

给麦卡锡，麦卡锡则回报给她轻松的生活、文学社和文学视野。在与麦卡锡的通信中，阿伦特自由地表达她的情绪——她的失落或丧气，并显示出她是多么需要被当作女人和朋友来对待，而绝非仅仅是名人或其思想比他人高出一等的人。同时，作为旅行家和作家，麦卡锡的欧洲气息足以让她将阿伦特视为政治上的美国人以及性情上的欧洲世界公民。在布吕赫 1970 年死后的岁月，那时雅斯贝尔斯也已去世，麦卡锡深知她朋友的哀恸，为她提供了“四壁”。

汉娜·阿伦特和她先前的情人与老师，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 1925 年到 1975 年间的通信与其他已出版的通信完全不同，<sup>6</sup> 这些通信的德语版在 1999 年出版，英语版 2004 年才问世。阿伦特去世后不久，海德格尔于 1976 年辞世，之后，这些信件便被封存在马尔巴赫文献库中，当我撰写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关系时，特别是她年轻时与海德格尔的关系，我不得不依赖对知道这件事情或略知战后两人关系发展的人的访谈。这样一来，我的传记就低估了海德格尔在战后对阿伦特思想发展所发挥的作用，这既包括他们在 1950 年的重逢及以后，也包括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光，那时阿伦特在撰写《心灵生活》。我的传记当然也未处理他们去世后围绕他们关系所激发的争议，通信集的出版也没有平息这些争议。阿伦特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现在与马丁·海德格尔是无法分开了。

与其他通信集不同，出版的海德格尔通信是不完整的。海德格尔大部分的信件都包括在内，但阿伦特写的信则很少。她的信从在马堡(1925—1927)他们的关系开始之时就遗失了，那时海德格尔正在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所以我们读不到她是如何形容自己最初的感受的。1950 年他们俩重逢，那时海德格尔因其纳粹党党员身份及支持希特勒而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经历，尚被禁止教课。这一重逢时期，海德格尔写了大量的信给阿伦特，但是阿伦特写给他的信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保留了下来。直到 1967 年后，真正的通信才得以看到。一直在编辑通信集的编者、一丝不苟的厄休拉·鲁兹(Ursula Ludz)在书中补充了大量的注释，很多次提到阿伦

特的著作以及与雅斯贝尔斯、布吕赫谈及海德格爾的通信，但海德格爾从未公开谈论过阿伦特。

将这一通信集与其他通信区别开来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其发表之前的丑闻。这一丑闻是由 MIT 的教授艾丁格(Elzbieta Etinger)有意炮制出来的，她曾被允许阅读阿伦特—海德格爾的通信，并引用了阿伦特这边的信件。<sup>7</sup> 她的《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爾》一书在 1995 年出版时，阿伦特与海德格爾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有过恋爱关系已为众人所知，这主要是因为我在这本传记中早已将其说出。我的版本，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是基于对阿伦特朋友们的访谈以及阿伦特的信件，特别是与她丈夫通信中少数几次对该事的提及，布吕赫从 1936 年他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月的最开始，就非常清楚这件事，当阿伦特说她将能够“像对待我那样对你”(1936 年 8 月 8 日)时，也就意味着她并不想隐瞒什么，并不惧怕评判。她也告诉了雅斯贝尔斯——海德格爾在纳粹上台之前曾是雅斯贝尔斯的朋友，雅斯贝尔斯在回应中接受了这一事情，并且未作任何评判。

艾丁格关于这件事情的描述虽然是基于阿伦特—海德格爾的通信，但却是个幻象。她勾画了一个幼稚无助的犹太女学生和一个富有魅力但无情的天主教教授形象，两人上演了一部充满激情的鲁莽、背叛和盲目忠诚的戏剧。她的汉娜·阿伦特形象是一个永远没有走出恋爱关系的人，是一个受虐狂，只是坚守对“绝对忠诚”的伟大之爱，即便她是一个被抛弃的女人。她向其丈夫隐瞒了她年轻时的私情整整十五年(第 42 页)，谴责海德格爾对其妻子的所有不忠，并对他的道歉(“她尽其所能漂白他纳粹经历”，第 78 页)和他想要阿伦特成为“善意的使者”(“阿伦特接受了这一安排”，第 74 页)施以诽谤式的诋毁。艾丁格的叙述充斥着“好像”、“你可以设想”和“她肯定感觉到”这类语词，这使得传记作家在自己的故事里设下圈套，并将其描述对象拉入自己的圈套之中。在她的书中，根本找不到好的传记性研究所应有的与叙述对象之间的交流。<sup>8</sup>

无需惊讶的是，这一幻象[在腰封上，阿伦特曾经的朋友、文学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推荐它为“最有价值”的书]使得阿伦特的



敌人们弹冠相庆。她的敌人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后那些年所引发的 20 世纪最为广泛而复杂的争议之后。那些将阿伦特视为良好判断力典范的人非常忧虑，却无力作出有效的回应，因为可能针对这一幻象的那些信件并不可用。艾丁格从上下文和歪曲的复述中抽取出来的引文，如同下流的谣言一样难以反驳。这样一来，双方的遗著管理者都意识到必须出版这些信件。

将这一系列通信与其他通信集区分开来的第三点是，与雅斯贝尔斯、布吕赫、麦卡锡、布洛赫和布鲁门菲尔德不同，海德格尔并没有阿伦特那种对世俗事务的持续兴趣，这一兴趣是在他们俩关系结束之后才有的，或者说是应对这一关系而发展出来的，她藉此来治愈年轻时对世俗事务的漠不关心。（她的兴趣是在跟随雅斯贝尔斯学习之后开始的，后来阿伦特惊讶地对雅斯贝尔斯说：“你的哲学为我思考政治事务做了多么好的准备啊！”[1949 年 3 月 11 日]）与她的其他通信者不同，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负责和乐于作出判断的人。作为德国人，他是 20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是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但他不是一个模范之人。

在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和布吕赫的通信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海德格尔的虚假与欺骗，他那分裂的自我，深深地震惊并伤害了阿伦特；虽然阿伦特没有如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分析人物那样对海德格尔进行充分的性格考察，但他的性格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她私人和公开著作的话题。汉娜·阿伦特最终也没有弄懂马丁·海德格尔之谜，到她临终前，她还在《心灵生活》中再次写他，此书是她在阅读了海德格尔著作之后开始写的，并作为海德格尔 80 岁生日礼物献给了他（包含在通信集中）。<sup>9</sup>

对阿伦特—海德格尔关系持有争议意见的许多评论家们塑造着两人身后的名声，这些评论家的立场基本分为两种。第一种认为，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个加入纳粹党的人，并且从来没有公开否定他身为纳粹党员的决定或行动。从这一角度来看，阿伦特是海德格尔的辩护者，因为她在战后恢复了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并且协助海德格尔著作的英译。第二种立场认为，海德格尔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在判断和行动上的疏忽应该被